

冯玉祥部曾火烧少林寺

少林寺有记载说,中华民国初年,正值军阀混战,土匪肆虐,民不聊生,少林寺为了保全千年古刹完好,主持释恒林成立少林寺保卫团,带领一众僧侣与土匪们对抗,寺院周围数十个村子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其后恒林故去,其弟子妙兴接任登封僧会司及保卫团团长。

民国十一年(1922年)第一次直奉战争时,直系吴佩孚(1873-1939年)部师长张玉山至登封,意在收抚陈青云、任应岐的部队。张玉山手下的河南暂编第四团团长樊钟秀途经少林寺打问休息,因见大雄宝殿残破,发善心欲修补,因军务繁忙,没有时间精力放在这里,于是暂时捐赠四百银元,打算用来购买物料之需。寺中大众非常感激樊团长,因此而与樊钟秀时有联系。

第二年(1923年)秋,吴佩孚受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。张玉山奉命在登封一带收编湖北第一师别动队,其第一旅旅长卢耀堂得知妙兴师傅武功出众,少林寺

内又藏有枪支,便极力拉拢妙兴,后来委以妙兴为团长,组成第一旅第一团。至此,妙兴加入了吴佩孚的军事集团。

民国十四年(1925年)二月,豫西爆发了“胡憨之战”。陕西的刘镇华派憨玉琨率军人入河南,与河南督军胡景翼作战,争夺中州。

胡景翼部樊钟秀派兰世勋运动驻偃师的憨部李慎亚倒戈。当憨部崔继华自密县退却时,妙兴率部队帮助李慎亚攻打崔继华,大大支援了樊钟秀。自此,妙兴与樊钟秀关系更加密切。

民国十五年(1926年)七月,广州革命军开始北伐。九月,冯玉祥(1882-1948年)宣布脱离北洋军阀,参加国民革命。

吴佩孚联合张作霖(1875-1928年)攻打冯玉祥,被北伐军击败。次年(1927年)春,冯玉祥占领西安,配合北伐军合攻河南。

二月,妙兴所率第一团奉命开往郑州,又调往舞阳。三月六日,在与任应岐部交战中,妙兴

阵亡,年仅三十七岁。六月,遗体由弟子体信运回少林寺,葬于寺东北山坡上。

民国十七年三月,建国军樊钟秀乘冯玉祥的国民军后方空虚,夺占了巩县及偃师县,但不久被冯部将领石友三(山)夺回。

樊钟秀南撤,转攻登封县城,其司令部即设在少林寺内。石友三(山)部向南追击,至轘辕关(十八盘),少林寺僧助樊狙击,终不敌而溃。1930年三月十五日,石友三(山)迫至少林寺,遂纵火焚烧法堂。

次日,驻防登封的国民军(冯玉祥部)旅长苏明启,命军士抬煤油到寺中,将天王殿、大雄殿、紧那罗殿、六祖殿、阎王殿、龙王殿、钟鼓楼、香积厨、库房、东西禅堂、御座房等处,尽付一炬,以泄厥愤。至此,千载少林寺之精华,悉遭火龙浩劫!

我们今天看到的少林寺都是后来还原的,部分位置不详的佛殿时至今日无法找到位置。

据搜狐历史

许世友带枪进京吊唁毛主席

1976年9月9日凌晨,许世友在广州接到了毛主席逝世的通知,同时中央召他立即进京。

许世友带了一支美式五星左轮手枪。这支枪还是从国民党一个军长手里缴来的,被他视为心爱之物,整天别在腰上,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

但许世友这次带枪进京,可就不仅是出于习惯了。

专机在西郊机场降落,许世友先去西山看了叶剑英,才回京西宾馆住下。听说有很多老将军住在301医院,他前去看望,并告诉他们,江青那帮人都到了北京,“你们要注意,‘四人帮’通知开会了不能去,去了可能把你们都抓起来。”许世友拍了拍腰上别的枪,“他们要抓我,我就开枪,打死一个够本,打死两个赚一个!追悼会开过了,我就回广州,不在这危险的地方。”

听许世友这么一说,王震、韩先楚等老将军也都要准备防身武器,并且约定,如叫开会,

先请示老师,他们不表态,就都不去。

毛主席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,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。轮到许世友时,灵堂门口的卫兵把他挡住了。

卫兵给父亲敬了个礼:“首长,您带枪啦?”许世友给卫兵还了个礼:“我怎么不能带枪?”卫兵说:“中央有规定,进灵堂不准带枪。”许世友问:“谁规定的?”卫兵答:“中央规定的。”“我是政治局委员,我怎么不知道?”许世友虎着一张脸,边说边往里走,卫兵没有一个伸手阻拦。在所有进入毛主席灵堂的党政军领导中,身上带枪的恐怕只有许世友一个人。

开完追悼会后,许世友回到京西宾馆,拒绝一切来访,独自坐在房内说:“毛主席走了,我心里难过极了,这个老人对我最好了……”

据《父亲——还原真实的开国上将许世友》

“朕”也曾是老百姓

中国古代的皇帝有一个变态的习惯,那就是凡是与自己有关的东西都不许别人染指,包括名字,包括人称代词,譬如“朕”这个第一人称代词。而在秦朝之前,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称“朕”,只是自从秦始皇以来,“朕”就和普通人无缘了。

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《尔雅·释诂》对“朕”作出了如此的解释:“朕,身也。”在先秦时代,“朕”是第一人称代词。不分尊卑贵贱,人人都可以自称“朕”。据司马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:秦嬴政统一天下后,规定:“天子自称曰朕。”从此,“朕”才由寻常百姓家飞入了皇宫之中,一去不回头。

在秦始皇之前的统治者,相对还比较谦虚。那时的诸侯王常常自称“孤”、“寡人”、“不谷”。“孤”者,谓自己不能得众也;“寡人”者,“寡德之人”;“不谷”,谷为食物,可以养人,乃善物,“不谷”即“不善”。由此可见,在秦始皇之前,统治者至少在表面上远远没有那么高傲自大。

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,统治者才开始感觉到不需要再如往常那么谦卑了,于是,“朕”也就应运走上了“唯我独尊”的不归路。

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“朕”虽然是皇帝的自称,但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,它的意思并不等同于其他第一人称代词“余”、“吾”、“我”等词,“朕”的意思更接近于“我的”。譬如在《离骚》中,屈原就这样说过:“朕皇考曰伯庸。”显然,这里“朕”的意思就是“我的”。

因此,在正常使用“朕”的场合,虽然有时也可以是第一人称的代指,但更多时候这个词倾向于“我的”。譬如,“勿废朕令”说得通,“勿废朕之令”就说不通。

另外,虽然“朕”字自秦始皇开始为皇帝的专用词,但有时别的人也可偶尔一用。例如《后汉书·和殇帝纪》:“皇太后诏曰:今皇帝以幼年,兢兢在疚,朕且佐助听政。”

据《智慧文摘》

汉代养“狸”捕鼠

作为宠物,猫的驯养历史要比狗的驯养历史晚得多。那么,家猫的饲养究竟始于何时?一部分学者根据《礼记》《诗经》等文献资料有关猫的记载,认为中国养猫的历史为两千多年。遗憾的是,埃及曾发现三四千年前关于猫的雕刻,而中国却至今还未发现同类文物。

1990年山东临淄的一处遗址中,在新石器时代的灰坑内发现一块动物的下颌骨,并附带第一前臼齿。生物学家鉴定认为属于家猫的遗骨,其牙齿端部不甚锋利,已有较高的驯化程度。考古研究所吴汝乍著文指出,中国家猫的饲养始于四千多年前,其理由除了龙山文化出土的猫骨与齿遗骸等实物外,他还分析了驯养猫的文化环境,指出家猫的驯养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

物。据考古资料记载,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已相当发达,粮食不仅可供人畜食用,而且因为有了粮食贮藏,鼠害的威胁日益严重,对猫的驯养便提上了日程。

在古代的大蜡礼中,奉猫为神,原因是猫食田鼠,去苗之害,对农业生产有贡献。只不过,大蜡礼中被奉为神的“猫”不是今天的家猫,当时称之为“狸”。

那么这个狸与后来的家猫是同一种动物吗?一部分学者认为狸与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唐宋时期,猫和狸的称谓是并存的,唐宋时还称猫为“狸奴”。但也有另一些学者认为狸与猫有别。近人尚秉和在《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》一书中指出,狸与猫性情不同,前者凶狠,后者温驯。他分析,两者性情不同,这也是汉代逐渐废狸而养猫的原因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华盛顿纪念碑里的中国礼物

美国首都华盛顿其最高建筑只有169米,这就是为纪念首任总统华盛顿而建的纪念碑。没想到的是,纪念碑里竟然珍藏着一件中国礼物。

这块中国石碑刻于咸丰三年(1853)。碑文百余字,取自徐继畲在福建巡抚任上所著的《瀛寰志略》。徐继畲系近代中国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先驱,他敏锐发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与众不同:“不设王侯之号,不循世袭之规,公器付之公论,创古今未有之局,一何奇也!”为此,徐继畲盛赞功成身退的华盛顿“异人也”,他大胆预言民主政体必将盛行于天下。

据《今晚报》

至尊为何称“九五”

“九五之尊”也可称为“九五至尊”。在汉语语言环境中,“九五”绝不可等闲视之,“九五”是个特定的概念,“九”“五”两个数字有着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,只有特定的人才能享有和使用这样一个概念,这个人就是皇帝。为什么“至尊”一定要是“九五”呢?

一般认为,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,奇数为阳,偶数为阴。阳数中九为最高,五居正中,因而就以“九”和“五”象征帝王的权威,称之为“九五之尊”。

也有人认为,“九五”一词的起源和《易经》密切相关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首卦为乾卦,乾者象征天,因此也就成了代表帝王的卦象。乾卦由六条阳爻组成,是极阳、极盛之相。六个阳爻,从下向上数就是: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,“初”就是第一位,依

次向上推,到六位(六位是上位,在乾卦中,就是“上九”)。为什么放着比“九五”还要高的“上九”不用,皇帝却只占定“九五”呢?这是因为比“九五”再高的地方是“上九”了,而“上九”的位置,就是“亢龙”,过犹不及,结局只能是“亢龙有悔”,这往往意味着倾、覆、亡、失、败、退。所以,中国古代的皇帝就老老实实地呆在了“九五”这个位置上。

从另外的角度看,九五都是乾卦中最好的爻,乾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卦,因此九五也就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第一爻了,它代表帝王之相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这样的观念在整个社会慢慢推广开来,于是人们自然就把“九五”直接和皇帝联系起来,用“九五之尊”或“九五至尊”来代指皇帝。

据《天津日报》

张作霖为何去世九年才安葬

1928年6月4日,张作霖被炸身亡。6月21日,“帅府丧礼筹办处”向各界宣布了张作霖去世的消息,并举行了隆重的治丧活动。

由于张作霖生前并没有为自己选好墓地,张氏家族便将其灵柩停放在帅府内。张家召集著名术士和堪舆专家,遍寻奉天地区的名山大川,最后选定了抚顺县(今抚顺市)水龙卧村作为张作霖的墓地。

1929年初,在张学良的支持下,“大元帅葬仪筹备处”成立,张作霖的老下属彭贤为总办。5月,“元帅林”正式开工建设,由于工程浩大,预计三年竣工。1931年,正当工程即将竣工之际,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“元帅林”工程被迫停建,“大元帅葬仪筹备处”的工作即告终止。日本关东军占领大帅府后,将伪奉天



民国初期之张作霖墓园(抚顺空六)

第一军管区司令部设在此处。一直安放在帅府的张作霖灵柩也被移至珠林寺。时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要挟张学良称,如果答应与日本合作,便将张作霖安葬于“元帅林”。国难家仇系于一身的张学良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,这虽使日本人的阴谋未能得逞,却也使张作霖的灵柩多年不能入土。

伪满洲国成立后,日本当局为消除张作霖的影响,始终不同意将张作霖葬在“元帅林”。彭贤

与张作霖旧部张作相出面,找到张作霖的拜把兄弟、时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,请他从中斡旋。张景惠提议将张作霖葬在其出生地海城。其间,彭贤积极组织海城各界联名上书要求将张作霖的遗体移葬当地。时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认为,海城是张作霖的发迹之地,葬在那里的影响不逊于葬在“元帅林”,断然否决了这个提议。

张景惠又提议将张作霖葬入位于锦县驿马坊村的张氏家族早期墓地。迫于舆论压力,日本人勉强同意,但提出必须以“满洲国协和会”的名义组织安葬仪式。为了将沦落在外长达九年之久的张作霖遗体尽快安葬,彭贤及张家亲友只好认可。

1937年6月3日,张作霖入土。

据《中国档案报》